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科主办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

主编 王政 邱瑰华
副主编 周生杰 郭全芝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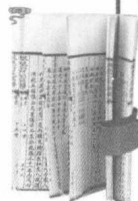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科主办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

主编 王政 邱瑰华
副主编 周生杰 郭全芝

第四辑



古典文献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4辑 / 王政, 邱瑰华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9

ISBN 978-7-5461-4712-3

I. ①古… II. ①王…②邱… III. ①古文学 - 文集
IV. ①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2536 号

出品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周振华 刘 春

装帧设计: 陈 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邮编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400 千

印张: 22.25

书号: ISBN 978-7-5461-4712-3

定价: 5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本刊学术顾问

杨 忠 北京大学中文系

余恕诚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徐有富 南京大学文学院

张国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丁 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朱万曙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杜桂萍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牛继清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主 编 王 政 邱瑰华

副主编 周生杰 郭全芝

编 辑 冀运鲁 任 荣

本期特邀编辑 张廷银

目 录

学术史与学术方法研究

一个乐天派写另一个乐天派

——写在林语堂《苏东坡传》译本之前 沈松勤(1)

程千帆先生在南大 徐有富(8)

海外汉学研究

“山川”、“山水”与水意识 [日]太立智砂子 文 李寅生 译(17)

古典文献研究

朱彝尊丛考三题 张宗友(29)

《太平御览》所录六朝《隐逸传》研究 马宏蕾(34)

遗弃与建构

——由欧阳修新见书简之性质引发的反思 王治洋(45)

苏州怡园建于吴宽“复园”旧址说考 郭明友(55)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案语文献价值述略 周生杰(63)

《清史列传·文苑传》订讹 金学波(73)

文献学术札记

隋唐雩祀礼仪 臧志攀 王 政(78)

《周易本义》之札记三则 朱天助(84)

熊十力“本心论”与大乘佛教思想比较 袁 政(95)

马其昶《老子故》探析 周 云(101)

从《养生主》到《养生论》

- 浅论战国至晋代养生思想、形神关系的逻辑进程 … 高 深(109)
- 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散记(一) …… 张通海(116)
- 先秦“公”字内涵考辨 …………… 傅 华(120)
- 中国的“山鬼”与日本的“山姥”
- 从泰山治鬼的民俗说起 …………… 李杰玲(126)
- 《归去来兮辞》中的“西畴”即陶渊明故里——栗里之田产
…………… 付嘉豪(141)
- 段玉裁《诗经小学》:与训诂密切相关的校勘 …………… 张慧颖(145)
- 略论曹丕书信的语言风格及其成因 …………… 朱珊珊(154)
- 书学与文学融通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 赵阳阳(160)
- 浅析正史中“龙”的帝王话语 …………… 李群喜(172)
- 先秦汉语中的异形词 …………… 杨世铁(181)
- 从清代文献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滞后问题 …………… 李汉丽(188)
- 朱子论《诗经》叶韵 …………… 陈 才(194)

古籍版本研究

- 现存南宋别集中所见宋集的编刻及其文化特点 …………… 林日波(204)
- 国图所藏两种《六书故》版本研究 …………… 张宪荣(213)

文学与文学文献研究

- “言经”“援圣”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 孙少华(223)
- 桐城诗歌流派的历史轮廓 …………… 王 成 高 田 周桂红(241)
- 王逸对屈原的尊崇与《楚辞章句》的注释 …………… 郭全芝(247)
- 悲剧命运中的精神支柱
- 屈原作品中“古贤”意象浅析 …………… 任 强(254)
- 蒙元文化视域下的“霸王戏” …………… 李俊慧(264)
- 再论才子佳人小说的界说 …………… 张 迪(271)
- 论蒲松龄对八股文代言笔法之借鉴 …………… 冀运鲁(278)
- 宋滕宗谅佚文三篇 …………… 汤华泉(289)

魏源杜诗选注探析	张 灿(291)
----------------	----------

安徽文献研究

清代徽州女性诗集十种叙录	邱瑰华 曹忠妮(301)
鲍氏知不足斋序跋题记系年	季秋华(310)

书 评

中国私人藏书家研究的典范之作

——评丁延峰教授新作《海源阁藏书研究》	周广骞(327)
---------------------------	----------

《焦循戏剧学研究》读后	郭艳艳(331)
-------------------	----------

千尺珊瑚费网罗

——评《颜延之诗文选注》	王京州(335)
--------------------	----------

开创之功与美中不足的遗憾

——评周飞强、王素柳点校的《读画录》	陈圣宇(339)
--------------------------	----------

稿 约	(344)
-----------	-------



一个乐天派写另一个乐天派 ——写在林语堂《苏东坡传》译本之前

沈松勤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福建龙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同时又是通晓中西文化的一位著名学者。他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却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苏东坡传》,就是他第二次到美国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作品之一。出版后,广受美国读者所喜爱,在全美读书榜上,两次名列前茅。

林语堂第一次赴美,在1919年秋,就读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92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继而转至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发源地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加盟“语丝派”,继而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杂志,提倡讲幽默作为“人生大计”、“文学要津”。1936年9月,林语堂第二次赴美,至1966年6月返台湾定居,渡过了长达三十年的旅美生活。在此期间,除了《苏东坡传》,他还出版了文化论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与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均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与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不同,《苏东坡传》是传记。正如本书译者所说:“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凭借想象,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象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传记作家首先需要尊重真实的历史,需要对传主有深入的了解正确的把握,不仅了解和把握,而且还要喜爱。林语堂在本书中说:

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那么,林语堂偏爱苏轼的是什么?又为何偏爱?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这就是林语堂偏爱苏轼的地方;而最使他偏爱的,是苏轼建立在高度智力与赤子之心之上的“乐天”思想和精神。这一点为林语堂再三强调,在本书的序言中,他指出:“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在本书的结尾又重申:“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一个人偏爱什么,当然与他自身的秉性与祈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类分”。林语堂偏爱苏轼的“乐天”,也正是他所竭力祈求且在其身上具有的东西。因此,不妨说,他的《苏东坡传》是“一个乐天派写另一个乐天派”;换言之,苏轼“乐天”的秉性或“思想的快乐”是贯穿《苏东坡传》的一条主线。

快乐与痛苦虽然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人世间没有痛苦,就无所谓快乐,没有快乐,也就无痛苦可言;而且苏轼“乐天”的秉性源于痛苦,苏轼“思想的快乐”在痛苦中酝酿而成。

苏轼踏上仕途不久,就遭遇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朋党之争,宋廷政治也因此进入了彼党唱罢此党上台的反复动荡的怪圈。在这个怪圈里,苏轼经历了三次在朝、三次外任、三次被贬,尤其是三次被贬,给苏轼编织了一场人生悲剧。面对悲剧,苏轼难免忧患痛苦,有时如同婴儿在饥饿时不顾何种场合而率性大哭一般,尽情呼号。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便说:

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

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文章题目中的“昌化军”在今天的海南省，当时苏轼被贬昌化军儋州；“谢表”是一种公用文体，官员受命到任或到达贬所，均要向朝廷提交一份表。表一般多写应酬性文字，但苏轼的这篇《到昌化军谢表》，却不乏发自肺腑的呼号，其中对险恶环境的恐惧、对生命的忧虑，溢于言表。而文中所谓“三黜”，就是指元丰二年的黄州之贬、绍圣元年的岭南惠州之贬和绍圣四年的海南儋州之贬。贬居黄州，对苏轼已是不小的打击，他在黄州写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便说：“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通过歌咏“苦幽独”的名贵之花海棠，寄寓了忧患迁谪之情。远谪惠州，苏轼面对“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苏轼《到惠州谢表》），不仅感叹空怀精诚报国之忠，而且顿生瘴地忧生之心，悲哀之情随之倍增。其岭南诗《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蜩雨愁黄昏。”抒发的就是这种悲哀之情。谪居儋州，既与子孙“已为死别”，身处瘴疠交攻之地，又“宁许生还”！更让他悲哀不已，其《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诗也体现了这种凄厉悲凉的情思：“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从黄州到儋州的“三黜”中，贬地越来越远，年纪越来越大，苏轼的忧患情绪一次比一次浓烈，悲哀心理一次比一次沉重。

在古代，岭南与海南诸州为瘴疠肆虐之域。唐代谚语“鬼门关，十人九不还”，说的就是岭南瘴疠的险恶。宋代也有谚语称岭南“春（州）、循（州）、梅（州）、新（州），与死为邻；高（州）、窦（州）、雷（州）、化（州），说着也怕”。在唐宋文献中，常有卫戍岭南的士卒“被瘴疠死者不可胜计”的记载。据唐代诗人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为了“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朝廷采纳了张九龄为相期间的“建言”，有意识地将官员贬往岭南瘴疠之地。而贬谪岭南，对于生活在不杀士大夫的宋代官员来说，无异于极刑。与苏轼同时被贬岭南的刘摯在《新州安置表》中说：“瘴疠之逼，于身何能淹久。”苏轼《赠岭上老人》诗也说：“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元祐年间，蔡确被贬岭南不久，便被瘴疠夺走了生命；哲宗年间，刘摯、秦观等大批被贬士人也相继葬身岭南诸州。这也就是说，谪居岭南，不仅是在政治上被囚禁，而且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沉沦，无怪乎苏轼在贬谪中难禁凄厉悲凉之情了。

然而，苏轼并没有因贬谪而消沉，更没有因此而被击垮，恰恰相反，谪居不断强化了他“乐天”的秉性。在每当凄厉悲凉之情来袭时，苏轼会很快镇定心志，化解悲哀，“快乐”地面对谪居，呈现出一派“乐意相关，生香不断”的“乐

天”心境。

北宋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诗说：“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程颢以为这两句诗“形容得浩然之气”；陈文蔚说这“是天理自在流行，而万物各遂发生和乐之意”；朱熹认为是形容“放令此心疏豁，无所执滞”；阳枋也说是形容“个中皆实理，何处是浮华”的疏豁无滞的境界。石延年诗句原本是以景对物，描写自然界的勃勃生机，道学家却用来阐释“天理”，以及用“天理”扫却“浮华”后形成的一种“内圣”之境，赋予了新的内涵；苏轼在将处穷忧生之悲化为浩然之气与和乐之意时，则更具生活化和生动性。

综观苏轼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三地的创作，无论诗词抑或散文，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以贬地景象和贬谪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个个充满“和乐之意”的、光风霁月般的意境。譬如黄州词《江神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邱，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词中的“东坡”，为苏轼的囚居之地。在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因“乏食”，求得故营地之东数十亩荒地开垦，名之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而且在苏轼看来，身处这块囚居之地，却犹如当年陶渊明驻足流连的斜川之境，一派“万物各遂发生和乐之意”，既美不胜收，又其乐融融。惠州诗《次韵子由所居六咏》：

堂前种山丹，错落马脑盘。堂后种秋菊，碎金收辟寒。
草木如有情，慰此芳岁阑。幽人正独乐，不知行路难。

惠州本为瘴疠交攻之地，在苏轼的心中，却如同身处江南秀色可餐之境，“乐意相关，生香不断”，令自己独乐不已！儋州诗《谪居三适三首》，则以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和夜卧洗脚三件卑琐俗事为题材，吟咏“谁能书此乐”的人生三适三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诗词意境源自苏轼的乐天心态，也就是他《与子明兄》中所说的：“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黄州之贬，促使苏轼将这一心态全面付诸人生实践，使他简化了人生，泯灭了穷与达、荣与辱、得与失之间的差别，即朱熹所谓“放令此心疏豁，无所执滞”。

不过，苏轼“放令此心疏豁，无所执滞”之境的形成，并非道学家的“天理”

所致,而是他不主常故的相对性思考的产物。在苏轼看来,人生是无常的,所以面对“贵贱寿夭”,不能“责之以常然”,否则便“多怨而不通”(苏轼《邵茂诚诗集叙》);与此同时,“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故而不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前赤壁赋》),则又通过宇宙人生“变”与“不变”的相对性思考,泯灭“责之以常然”的执滞之心。因此,迁谪黄州,以及囚居惠州、儋州期间,苏轼虽身处穷困忧生的凄凉境地,却能保持一份“胸中廓然无一物”的豁达与余裕,而且如其《与程正辅》所说: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话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这又体现了不主常故,遇境即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苏轼的《书海南风土》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文开篇写“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但笔锋一转,转出“儋耳颇有老人,百有余岁者往往皆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的事实,最后在“寿夭无定”的相对性论证与“习而安之”的泰然自若中,再次履行了他在《超然台记》中提出的“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脯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的“乐天”思想,轻松地化解了身处险恶环境引起的悲哀与恐惧。

苏轼《祭龙井辨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但犹如“江湖虽殊,其至则同”,当其为人所用,则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说的是儒、道、释三家思想对人生实践的指导作用。综观苏轼的一生,主导其人生实践的是儒家志在当世的人世思想和舍我其谁的济世精神;同时也汲取了释、道两家的思想养料。在入世济世中,苏轼际遇了残酷的政争,仕途坎坷曲折,九死一生,经历了一场人生悲剧。而对于人生,苏轼在青年时期就有了一种忧患意识,甚至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因此,他在入京应试途中所作《出峡》诗主张“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在《定风波》词中又强调:“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或“心安无累”,就是化解忧患,超越悲哀,快乐生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出仕之前,苏轼对人生的忧患,以及化解忧患就有了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随着仕途的展开,忧患的接踵而至,苏轼又不断向佛、道两家求取药方,化疗忧患。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安心法”。其《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说:“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这里的“安心法”便出自道家;与此同时,佛家也主张“安心”,

认为“心逐物为邪,物随心为正”,而“物随心”则“心无损伤”;“心无损伤”,才能“安心竟道”(《古老尊宿语》)。苏轼又将佛、道两家的“安心法”融化到了儒家思想中,他在解释《易经》“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句时说:

水,润下者也。在泽上则居,在泽下则逝矣。故水在泽下,为泽无水,命与志不相谋者也。故各致其极,而任其所至也。(《东坡易传》卷五)

《易经》是儒家六部经典即“六经”之一。传说“文王囚而演《易》”,苏轼因居贬所时也写了一部《东坡易传》。苏轼演《易》,是通过自身的谪居生活感受,演绎经典的意义。上列文字就演绎了《易经》以“泽无水”比喻人处困境,以及如何面对困境之意。苏轼认为,当一个人的命运与志向相背离时,应各随其运,具体地说,既任凭穷达祸福死生之命的运转,又不以穷达祸福死生的命运丧其志、动其心;唯其如此,才能我行我义;我行我义,则我志何往而不遂,我心也就安然而乐了,即其《答程秀才》所谓“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上述不难看出,在思想层面上,儒、道、释三家养料如同一贴多味中药,被苏轼融合成了一贴养心剂,明显起到了养心、安心效应,因而使他在险恶困苦的环境中,能履险如夷,化险为夷,化解与超越了九死一生的人生悲剧,始终保持光风霁月般的赤子之心,以一位“乐天派”的智者形象与世人相视而笑!

当这位“乐天派”穿越时间隧道与现代人相遇时,为林语堂所特别偏爱,并以传记的形式生动而又立体地展现其“乐天”的行迹与秉性。林语堂之所以偏爱苏东坡,挥笔撰写《苏东坡传》,固然为了“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但更主要他也是现代的一位“乐天派”。

诚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林语堂的人生就是在悲剧中创造快乐和幸福的人生”。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曾强调:“人生是多么不确定,吾们倘知道了甚么足以满足吾们,便紧紧把握住它,有如暴风雨的黑夜,慈母之紧紧抱住她的爱子。”其《生活的艺术》又指出:“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便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在这些形象化的语言中,透露了林语堂与苏轼一样对人生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快乐人生的渴求。因此,超越忧患,简化人生、知足常乐、苦中作乐,幽默风趣成了林语堂的一门生活艺术,一种实践哲学。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能够持有如此通达健朗的人生态度者,林语堂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基于这一人生态度,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品格特征,不妨写悲剧为例。悲剧在现代作家如鲁迅、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人笔下,是一种屡

见不鲜的文学形象；林语堂也写悲剧，但都与他们不尽一致。如众所周知的鲁迅笔下的诸多悲剧形象，都是被苦难毁灭了，读来给人予灵魂上的冲击与道德上的震撼。林语堂笔下的悲剧形象自然也遭遇苦难和不幸，但能够安之若命，不受苦难之累，不为不幸击垮。如《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红牡丹》中的梁牡丹等悲剧形象，她们都有着惊人的承受力，也都能化解与超越苦难与不幸，在不幸中显现达观从容的人生境界，在苦难中呈现超越现世本身的人生智慧，读来给人予精神上的潇洒和智慧上的启迪。

毋庸赘言，从生活艺术到文学创作，均体现了林语堂“思想的快乐”，也表明了林语堂与苏轼一样是一位“乐天派”。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偏爱苏轼了；同时，对下列林语堂在本书中的一段充满深情的文字、包括整部《苏东坡传》的蕴涵，也会有更为深切的理解和把握：

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所在。

（作者：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310027）

程千帆先生在南大

徐有富

1978年夏天,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受匡亚明校长的委托,到武汉大学接洽程千帆先生的调动事宜,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渔村边的破屋里找到了程先生。当时程先生已六十五岁,当了十八年的右派分子,已办退休手续成了一名街道居民,尤为不幸的是其夫人沈祖棻因为车祸已于1977年6月27日去世。叶子铭向程先生传达了匡校长的意见,并问他有什么条件。程先生激动地说:“我要工作,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什么条件?这就是条件。”叶子铭回答道:“这好办,你去吧,其他一切事我们包了。”^①就这样,程先生于八月底来到南大,他和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关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随着罗根泽、胡小石、汪辟疆等名师相继去世,陈中凡先生因为年迈,早就离开了讲坛,正缺一个学术带头人。程千帆调来以后,1979年至1981年培养了三名硕士生;1981年建立了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也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全国首批博士点之一。为了有利于研究生转益多师,也为了提高教师水平,做到薪尽火传,后继有人,程千帆随即邀请四位志同道合的副教授组成了学术梯队。1984年程先生培养出了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同年,卞孝萱年逾花甲调入南大中文系,介绍人就是程先生。卞先生说:“我跟他只是文字之交,此前根本就不认识,他却非常热情地把我介绍到南大古籍所工作。”^②由于卞先生的调入,南大古代文学专业实力更强,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

① 程千帆:《匡老!是您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1期。

② 《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纪要·代表发言》,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4页。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享此殊荣的只有北大、南大两家,而这也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程先生的带领下,南大古代文学专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程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1952年实行教学改革,该课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道:“一九七八,我重行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①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这门课程本来是为三位硕士生开的,但是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当年程先生上这门课时的盛况,生动地说明了人文学科师生对文献学知识的渴求。1982年国家教委委托南京大学主办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经验交流会,程先生在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此后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普遍开设了古典文献学课程。程先生还和我花十多年时间合著了《校雠广义》,该书被有的书评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②,曾获得过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仍被不少学校用作研究生教材。以文献学为基础有力地克服了学术研究空疏的弊病。

特色之二是提倡博通。程先生认为:“在广泛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某一领域,乃是古今学者取得成就的通途。”^③古代文学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追求‘专’,而忽视‘通’”。一个突出例子是将一部文学史分成几段,一位教师只能教其中的一段,比如研究隋唐五代的,别人问到陶渊明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陶渊明是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同我没关系。问到欧阳修,又说:欧阳修是宋朝的,也同我没有关系。程先生在《治学小言》中批评道:“对于某一门只知道一点点,其余一概不知道,这叫什么专家?这是个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从前有一个笑话:一个将军打仗,被敌人射了一箭,射到肉里去了,请一个医生来看。这个医生就拿一把小锯子将箭齐肉锯断,说:好了。将军说:箭还在肉里没有拿出来呀!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情,我是外科。这样的学风就是‘锯箭疗法’。”^④

如果我们打开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几位老先生的著作,如《程千帆全

① 《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1年第1版,第8页。

② 陶敏:《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评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载1999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

③ 程千帆:《治学要重视解决矛盾》,载《治学小言》,齐鲁书社1986年第1版,第29页。

④ 程千帆:《谈谈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载《治学小言》,第64页。

集》、《卞孝萱文集》、《周勋初文集》就会发现,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包括许多方面,即以程千帆为例,有文献学著作《校讎广义》,有史学著作《史通笺记》,有文艺理论著作《文论十笺》,有诗学著作《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有文学史著作《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还有文学创作《闲堂诗文合钞》、《桑榆忆往》。如果打开他的论文集《闲堂文薮》,就会发现所涉及的内容还有辞赋、小说、戏剧、传记等。其特点是既“博”且“通”,而“通”更加重要。郁贤皓指出:“‘通’字有两个涵义,一是说千帆先生对国学的各个领域都研究的非常深入、细致,无所不通。另一方面是指千帆先生对经史子集传统国学内容和学术思想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①如何做到“通”呢?程先生《詹詹录》指出:“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底。黄季刚老师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工夫:《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②因此他专门为博士生设计了专书研读课程,要求博士生攻读先秦两汉六种经典著作,外加《文心雕龙》和《文选》,每一部书都由一位导师具体指导。这对培养博通的学风确实是大有好处的。

二、关于人才培养

北京大学陈平原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③程先生反右前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著名的有陆耀东、吴志达、吴代芳、周勃、黄瑞云、贾文昭,以及诗人韦其麟、晓雪等。来南京大学以后,又培养了九名硕士生、十名博士生。日本学者成田静香在《东方》杂志上介绍《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时,用了“程门弟子”一词,后来它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程先生还在遗嘱的最后专门提到:“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④

这些极为优秀的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现在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

① 《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纪要·代表发言》,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第337页。

② 《詹詹录》,载《文史哲》1981年第3期。

③ 《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第137页。

④ 载2000年6月15日《南京大学报》。